

大学之用途与滥用

王建华^{*}

〔摘要〕 大学有多重性格,也有多种用途,但就像没有万灵药一样,也没有哪个机构是全能的。现代以降,科学和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空前繁荣。这种过度的繁荣使诸多利益相关者对大学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企图。伴随政府和社会对于全能大学的不断追逐,对于大学的滥用不可避免。为了满足现代社会自身的合法性诉求,大学的规模不断增大,职能不断增多,甚至于被卷入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其结果,大学教育对于人性的培养被忽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职能被边缘化,大学的精神内涵日益空洞。

〔关键词〕 大学;用途;滥用

我们时代普遍认为,大学是重要的,甚至太重要了。分歧的关键在于,大学因何而重要。政治论者认为,大学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认识论者则认为,大学丰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但无论政治论的还是认识论的,归根结底都是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即将大学作为实现某一目的的工具。按席勒的说法:“现代人处于分裂状态,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处于疏离状态。他总是审视自己的冲动和目标,总是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现代人受没完没了的个性危机的影响,只有人深思熟虑之后才会采取行动。结果行为的工具性越来越强,盘算越来越多,根本不是自发的。”^①现代社会中的大学也是这样。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不再是大学的常态,理性的规划或战略管理成为一种惯例。为了满足社会的欲求,自发秩序被遮蔽,建构主义主导着大学的工具理性。作为一种理性机构,现代大学的工具主义既不能归结为它的组织属性,也不能归因于大学人的自利性,本质上它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在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学者对于真理不再心存敬畏,学术职业也不再是天职的召唤,此时大学作为工具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大学本体的危险性。当前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正在演变为一种学术的攀比,国际论文发表的锦标;而为了满足机构的虚荣,普通高校“大学化”,研究型大学“哈佛化”亦愈演愈烈。当前无论在哪个国家,“学校将自己归属于‘大学’,极力地求得大学的公认,以此增强自身存在的永恒性。高等教育制度竭尽全力将自身描绘成大学,常常炫耀不符合实际的

^{*}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中心、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880066)研究成果。

①[美]巴尔赞:《艺术的用途和滥用》,严忠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

制度历史或者自画像,“(其)编撰的传统”中,多数是民族国家自身典型的特征。”^①就像一个人的失败通常也源自他的成功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人们倾向于将大学当作万能或全能的机构加以狂热追求时,它的用途就极容易遭到滥用,从而导致大学的异化。今天不同国家间一流大学的竞赛虽然不像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那样危险,但学术发表的竞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且不能不察。当各国政府不顾及大学的本质,忽视人性的培养,投入巨资以求在国际学术发表中胜出时,大学的用途常常会起到反面的作用。正如“艺术既能美化和提升给予其生命的文明,也能削弱和破坏文明。”^②我们时代的大学也既有可能提升人类的文明,也有可能削弱智识生活的活力。关键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大学,如何使用大学。

一、警惕强国民族主义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迷思”,强国民族主义作为某种无法治愈的顽症时时发作。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人们不由自主地将个人的幸福、安宁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国家的强大和个人的幸福没有必然的联系,过度的追求国家的强大还可能会本末倒置。因为没有个人的自由、幸福与安宁,国家的强大又有什么用。无论何时,国家只应是实现公民幸福的一种手段,国家的强大本身绝不能成为最终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大国或强国总是周期性的出现,但强大的国家并不总是意味着人类文明或文化发展的顶峰。因为强大的国家既可能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极有可能是暴力统治的工具。强大的国家可能带给人民幸福与安宁,也有可能更加沉重地奴役自己的人民。当前在民族国家的计算和算计下,现代大学正在逐渐沦为强国民族主义的工具,似乎国家的强大与大学的崛起可以互为条件和结果。当大学的崛起与大国的崛起被媒体和学界总是有意无意的相提并论时,它也就与我们对大学的大肆吹捧不谋而合。“这些陈词滥调的思想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思想的错误在于,它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它拥有好的学校,即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过去一个世纪虔诚的‘唯心主义’思想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它把学校认定为一种军事力量,但这种力量学校本身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在那个世纪,为了表示对一件事情的高度热情,或者只是为了显示出对事情的一种特别尊崇,必须把事情夸大到英雄神话般的程度。”^③事实上,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将国家的强大简单归因于学校或大学的强大都是一种可怕的误导。就像滑铁卢战役的服利绝不能认为是伊顿学院的功劳,第二次普法战争的服利也不能简单的归功于柏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大学的崛起与大国的崛起背后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中世纪大学兴起之时,欧洲在政治上还处于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尚未萌芽。近代以后,柏林大学兴盛之时,德国境内也还是邦国林立。时至今日,在欧洲一些小国大多都会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而在欧洲之外很多大国或强国的大学倒经常是末流的,甚至是不入流的。大学的崛起更多的是文明的演化,学术与教育不断繁荣的结果;而大国的崛起背后却更多的是经济,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因此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大学的崛起都无法促成,更无法保障大国的崛起,大国的崛起也不必然意味着大学的崛起。但遗憾的是,在强国民族主义情绪下,很多人总是先有信念而后再找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信念。经由这样一个“合理化”过程,政治家总是莫名的自负,认为强大的国家就能有一流的大学,同时高等教育研究者也容易有一种难言的虚荣,喜欢夸大大学的重要性,强调一流大学对于国家强大的重要。面对此种政治正确的论

① [美] 帕翠西亚·冈伯特:《高等教育社会学》,朱志勇、范晓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

② [美] 巴尔赞:《艺术的用途和滥用》,第25页。

③ [美]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调,我们一定要有所警惕,“绝不可把‘合理化’理解成这样‘化’了之后的信念就真正‘合理’了。”^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大学是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性有一个必然的边界,即大学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对于教育和学术事业的繁荣,对于人性的培养很重要,或至关重要;但对于国家经济的增长、军事的强大,即便在今天大学所起的作用依然十分有限,至少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强大完全是因为它拥有诸多世界一流大学,那即便不全是倒果为因也肯定是夸大其辞。自中世纪以来,强国可以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也可以不是强国。既是一流强国又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情况也有,但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二者的同时出现有内在的必然性。充其量,大学的崛起只是大国的崛起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是必要条件,更不会是充分条件。就像教育无法救国,大学的崛起亦无法保证大国的崛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有伟大的大学;同样,没有伟大的学校,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但是,国家的宗教信仰、政治家的治国才能以及其他众多因素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取决于诸多因素综合体现的结果。”^②因此,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强国民族主义情绪必须有所警惕。

当前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大学是国家的大学。大学与国家在最高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整个近代时期,大学是在特殊的(通常也就是民族的)政体结构中传播这种知识。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讲,反映的不是教育制度的结构,而是政治制度结构。在更中央集权的政体中,大学趋向更加的中央授权与中央资助,教授也更可能成为国家公务员。这种区别的一个主要意义在于,在更中央集权的政体中,人们感觉到高等教育的成败更可能归因于国体、国家教育部,而不是创业型大学的校长或者友善的赞助人。于是,弥补这些失败的改革,很可能促使更中央集权的路线出现。”^③对此事实,我们无法否认,也无须否认。国家可以为大学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制度性保护,大学亦可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必须注意的是,大学与国家在最高目标上的一致性绝不意味着大学就应对国家的需要亦步亦趋抑或完全沦为国家的工具。不容否认,对于国家而言,大学是有用的,而且是有大用。也正是基于这种有用性,大学在现代社会才不断走向繁荣。当然,大学的繁荣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于它的欲求,为了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欲望),对于大学的滥用几乎不可避免。如克拉克·克尔所言:“美国人民那么多的希望与恐惧现在都关系到我们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我们的大学——希望长寿,希望进入外太空,希望更高的生活水准;害怕俄国或中国的霸权地位,害怕炸弹和毁灭,害怕个人在变化世界中失去目标。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大学已成为国家目标的至高手段。这是新的气象。这是现在席卷我们大学的转型的实质。”^④鉴于实践中组织欲望的无限性,为防止国家对于大学的滥用,必须使国家与大学保持适当的分离,正如当初国家和教会的分离一样。如果为了强国的目的,使大学彻底沦为国家富强的工具而不是人类文明的使者,那绝不是福音而很可能是噩耗。

总之,现代大学对于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的确十分重要,但大学的用途有其边界,不应也不能被滥用。否则,只会适得其反。诚如斯特劳斯所言:“如果事先没有经过可靠诊断,或者这个诊断被无根据的希望或对权力的恐怕所篡改,那么对症下药的政治商议就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必须从几乎无希望处寻找希望。为了治愈我们社会的弊病,我们可能被迫满足于能暂时减缓病症的方法,但我们不能把治标和治本混淆起来。”^⑤无论何时,大学就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尊重大学的逻辑而非国家主义的逻辑。打造高等教育强国也需要遵循高等教育的逻辑而非强

① [英]斯泰宾:《有效思维》,吕叔湘、李广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8页。

② [美]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第48页。

③ [美]帕翠西亚·冈伯特:《高等教育社会学》,第187页。

④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高铨,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⑤ [美]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国的逻辑。虽然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在客观上会有利于国家的强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无论如何,高等教育和大学本身都不应成为强国民族主义可兹利用的工具。如果我们在价值观上被强国民族主义所绑架,以强大的政府作为大学的主人,继而再以大学的强大作为国家强大的工具,那么无论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还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都有可能半途而夭折。因为,强大的政府为了国家的利益,总是试图凭借无限的权力来推行“完美的计划”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从而必然或极可能会破坏大学的自发秩序,损害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使真正的创新成为不可能。

二、反思大学职能膨胀

传统上,大学有三种用途,即提供高等的教育、高深的学术和专业的服务。现代社会的“专业主义”倾向使得现代大学的专业服务职能急剧膨胀。无论擅长还是不擅长,只要国家或社会提出要求,大学都需要装腔作势地做出回应。近年来,伴随着对于大学功能的滥用,大学作为专业组织的含义正在受到侵蚀,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大学越来越多地卷入了不能胜任或不擅长的活动之中。伴随着大学非正式职能的增加,大学体制在跨界活动中的非专业性愈来愈明显,非正式职能对于核心职能的挤占效应也愈来愈明显。此外,由于市场化的影响,当前在大学内部还存在一系列关于资金、排名、声誉以及学术生产的无休无止的竞争,大学实际上所发挥的用途和它宣称的用途之间的差距正不断拉大。

历史上,大学的产生虽有实际用途的考量,但其走向繁荣却主要是因为其满足人们精神生活和理性启蒙的需要,它的合法性源于哲学而非社会学。而今天,随着高深知识的应用性的不断增强,随着大学的世俗化日益加深,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成为了大学主要的合法性来源。我们时代国家对于大学的重视不再是由于大学可以为民众提供系统的人生哲学,人们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再是为了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获得政治经济的收益,并同时完成自身的社会化。在我们时代,大学作为一个专业化的学术组织,投资与收益主导着一切,凡事大多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大学正因为经济原因,以及因为要求大学为经济服务而改变。表面上,我们时代是大学最为繁荣的时代,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对于大学如此狂热,也没有哪个时代有如此多的人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实质上,我们时代的大学在理念上完全被功利主义和功能主义所主导,进入了大学未必意味着接受了高等的教育。现代大学由于对精神生活的遗弃将自身降格为了一个高等文凭生产的流水线。在这条流水线上,大学被各种职能所分割,人也被根据社会需要贴上不同的标签或戴上不同的面具。当我们时代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建设了越来越多的大学,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学生时,我们可能也自觉不自觉地用大学的职能摧毁了大学的精神,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它们就好比是机器,由于长期的使用和滥用,已变得破损不堪了。”^①某种意义上,由于对大学的过度使用或滥用,我们时代的大学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更可怕的是,当前我们还完全无视对于大学的滥用可能带来的危机,而是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大学改革做得还不够好、不够彻底。其结果,改革刺激了进一步的改革,而丝毫不顾及改革本身的副作用。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通过不断的改革可以使大学变得更好、更有用,大学的理想会在改革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世界一流大学很快就会诞生。但事实绝非如此。由于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容易忽视对大学本质的反思,为了眼前的利益或满足现实的需要,“在多数情况下,只会出现这些实践的“虚拟采纳”(virtual adoption),直至这种时尚

① [美]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第36页。

消失殆尽。”^①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改革的方向有误,改革越努力、越成功,我们距离理想的大学就会越遥远。

不可否认,我们时代确实需要大学,需要更多更好的大学;但我们不能把“需要”异化成了“想要”^②。大学是可以培养专业的人才,也可以贡献专利技术,还可以提供社会服务;但这些仅仅是大学的具体职能,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远不在此。我们时代对于大学的用途的考量多聚焦于其形而下的层面,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形而上的东西。在形而下的层面,大学的用途很容易被滥用,随着大学职能的膨胀,大学什么都能做也就意味着大学什么都做不好,乃至变得徒有虚名。如加塞特所言:“一个机构试图给予其不能给予和得到的东西,那它是虚伪腐化的。然而,这条具有欺骗性的原理却存在于目前大学的整个规划和机构组织之中。”^③苏格拉底曾指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一种接近于疯狂的行为^④。同样,假想大学具有一种它实际上并不具有的职能,也是一种接近于疯狂的行为。它会让大学一天天变坏,连带着让我们的时代精神也一天天趋向不公正。社会对于大学的狂热会使大学误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大学对于真理的追求将被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所遮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了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智识的诚实将不复存在,公然的造假或学术扯淡将成为公开的秘密。大学的本质是形而上的,其“大用”是精神而不是职能。现代社会大学的任一具体职能都很容易被替代,但其精神则无可替代。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时候该用大学的职能,什么时候该张扬大学的精神。遗憾的是,我们时代的大学被高度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实用色彩日益浓厚,精神性日益稀薄。大学早已不再是“世俗的教会”而是变成了“知识工厂”和“专利公司”。

某种意义上,对大学的滥用也是对理性的滥用。因为对理性的滥用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对于大学制度的性质和用途做出错误的解释,进而根据这种错误的解释来肆意建构所谓的“现代”大学制度。那些凭空想象的制度体系也许听起来很美,但实施起来可能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神话,大学之于理性犹如教会之于信仰。就像中古时期人们期待通过进入教会以获得信仰一样,现代人也期待通过进入大学以获得理性。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大学,大学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大学成功地转变成了一个全球性制度,但这同时也是大学分崩瓦解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阶段类似于19世纪,人们普遍对大学的未来深表忧虑与期待。”^⑤作为一个理性的场所,过去的大学最重视的是“理念”,而现在最重视的则是“用途”。重视大学的“用途”没有什么不好,但若只强调“用途”就绝对是一种严重误导。在数据为王的时代,大学陶醉于各种指标的进步,而对于教育的危机浑然不觉。我们在最需要教育的时代却极大地忽视了教育本身的重要性。“通过教育从而获得反思和辩驳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是具有高尚人生境界的一种标记。无知之人对真理竟狂吠不止时,那怕他是皇帝,我们都可以对其嗤之以鼻,而将其看作未受过教育启蒙、灵魂干瘪苍白的粗鄙之人。”^⑥毫无疑问,大学的重要源于人的重要,而人的重要则在于人的想象力。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沟通人的心灵和情感,丰富人的想象力。如果大学忽视了对人的教育而致力于论文的发表,抑或为政府和产业提供专业的或并不专业的咨询服务,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是永恒的。严格来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大学既不是自古就有也很难保证将来永在。从中世纪到现在,大学屡经波折,凭借思想创作和科学

① [美] 帕翠西亚·冈伯特:《高等教育社会学》,第297页。

② 王建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美]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第63页。

④ [德]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⑤ [美] 帕翠西亚·冈伯特:《高等教育社会学》,第194页。

⑥ [德]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9页。

研究,侥幸躲过危机,充其量只能说是“幸存”。当前由于失去了对于人性的关照,现代大学危机重重,前景并不明朗。巴尔赞曾言:“我们时代的艺术是一种没有理论的惯例。”^①我们时代的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缺少思想创作和观念创新,现代大学不过是沿袭近代大学的惯例而已。

总之,在“职能主义”导向下,功利主义的教育败坏了教育,科学主义的学术也会腐蚀学术。表面上看,现代大学科学研究高度繁荣,经典的大学理念似乎还在被坚守,但实质上,高等教育实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所言说的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从理念到制度,从规则到实践,其间的脱节已经司空见惯。世界各国的大学改革都像是说一套做一套,理论上或政策文本上宣称的目的和实践中执行的计划可能完全是两回事。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涉及教育治理的文献到各国政府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字面上可能都还会重申要尊重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也可能都在强调大学教育之于成人的重要意义;但现实中的大学改革在政府的控制或主导下则完全被各种各样的实用计划所分割,高等教育因丧失目标而显得支离破碎或高度的形式化。由于失去了经典的教育理念作为引领,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之所以选择上大学不再是为了真正高等的教育,而只是为了了一种能够授予高级文凭的四年制培训,其目的更多在于文凭或证书的获得而不是高深的知识,更不要说是教养。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学术本是文明社会用于防御野蛮的壁垒,却更经常成为回归野蛮时代的工具。历史已经证明,学术在逐步退化,但这次面临的危险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次的危险源于我们称为哲学的东西。通过这种哲学,人类的宽容被推向极端,极端的宽容是不可能的,所谓的绝对宽容最终变成某些人的极度仇恨,这些人最明确有力地表明,人类及大千事物的本性里有无法改变的标准。换言之,人类企图使每个人都接受教育,最终导致对教育质量的不断忽视。”^②现代大学深受大众民主的影响,越来越重视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而忽略了用以培养人性的人文教育,其结果,现代大学培养的人越来越追求外在的利益而忽视了内在的品质和德性。

三、重申思想创作

人类历史上,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是第一个思想的盛世,这一时期所创造的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稍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创造了人类社会第二个思想的盛世,现代社会的一切观念均可在那里找到根源或原型。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逐渐被利益所主导,进入一个经济的盛世,同时也是“无思”时代^③。我们时代原创的哲学观念付之阙如,物质主义大兴其道。如尼采所言:“在这样一个强制与表面服从的世界中——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的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下一个学术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④作为人类思想的堡垒,大学与思想的创作和原创思想的诞生密不可分。一方面大学在创造着伟大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学也在被伟大的思想所创造。现代大学的很多观念或理念均源自于19世纪,得益于当时的启蒙运动。对于现代大学而言,19世纪可以看作是一个思想的“终结期。”20世纪至今的大学不过是对19世纪近代大学观念的扩充或落实。二次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但原创性的大学观念却极为罕见。某种意义上,19世纪也是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在此之前,大学是思想的殿堂,一流大学往往以一流的思想为

① [美]巴尔赞:《艺术的用途和滥用》,第23页。

② [美]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③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④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37页。

标志,伟大观念的涌现或变迁直接影响大学的兴衰,同时大学的兴衰也象征着思想的繁荣与衰退。就大学的发展而言,20世纪以前成就一流大学的往往是伟大的人物、经典的理念而非巨额的资金、显赫的排名。历史上,那些经典的理念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的大学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些提出经典理念的思想家往往也是大学的制度创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这方面的人物,国外的比如洪堡、弗莱克斯纳,国内的比如蔡元培、梅贻琦等都既是经典大学理念的诠释者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开创者。“成功的制度创业家能够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政治权力和领导技能,成功地应对这些多元的,通常又彼此冲突的制度需求。制度创业家‘率先集体努力将新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融入社会结构中。’他们对制定政策议程、预先安排事件,管理政治冲突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于是加强了他们活动的合法性和可信度。”^①20世纪中叶以来,大学逐渐成为收入最大化的自利性组织,相较于科学的发现和组织的发展,思想的重要性逐渐淡出。能够集教育思想家和制度创业家于一身的大学校长或政府教育官员近乎绝迹。

实践中,由于思想经常意味着异议,在政府眼中思想的传播是危险的,但是控制思想会更加危险。一个成熟的政府或理智健全的社会对于异端思想必须宽容,对于理性的批评要勇于接受,至少是承受。绝不能把对成绩的肯定异化为对于现有制度的奉承,也不要将对现状的批判当成对于根本制度的否定。正如施特劳斯在他的书中所警示的:“正因为我们是民主的朋友和同盟,我们才不可对民主阿谀奉承。”^②但现实中,政府很容易把批评当成反对,把奉承认为是支持。伟大思想的创作需要宽松的环境也需要时代的机遇。思想的创新没有什么规律,它需要宽容和自由的氛围来孕育。大学的思想创作绝不是为了对抗政府,而是为了防止政府可能会犯危险的错误。大学当然不是政府的敌人,但也不能成为政府的朋友或盟友,更不能成为政府的奴仆。在思想领域,如果大学坚持与政府作对,那么它极有可能失去政治的合法性;同样,如果大学沦为政府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宣传部门的喉舌,那么一旦政府的行为出现偏差,将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可以发出必要的预警,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专业化的建议。最终,受损的是整个国家,受害的是全体人民。一个理智健全的社会,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赋予大学以独立的地位、自由的空间,必须宽容学者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议。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会企图去颠覆所在国家的政权或正常的统治。本质上,大学是非政治性的学术组织,大学的行动是有边界的,其对于政府的批评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更加自由、民主和文明。政府应相信大学的善意,承认大学的智慧,勇于接受来自大学的尖锐的批评。政府若对大学怀有敌意,为避免批评的发生,主动收紧言论自由的空间,或垄断意识形态的供给,所得到可能并非真正的思想认同或政治忠诚而更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服从,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各个领域象征性行为大量发生。“象征性行为(symbolic behaviors)往往就出现在这种情况之下,试图操纵外部行动者的印象,或仅仅显示出想满足种种需求的意图。所有象征性行为成功与否,取决于其维系组织合法性的程度。在犬儒主义者看来,这是公众关系问题,更难听一点,是欺骗、谎言。不过,从组织角度看,象征性行为体现出组织在面对难以支持的环境时想努力获取生存,或者需要保护资源、维系价值观。”^③象征性行为在表面上维系了思想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但实质上也掩盖了根本问题所在。一旦被延缓的深层次的危机被引爆,整个社会将失去凝聚力,迅速被瓦解。“因为所有的装饰都会掩盖被装饰的东西。”^④思想领域的问题终究应该经由思想的创作来回答。在这方面,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若以绩效作为统治的唯一的合法性来源,继而以意识形态来替代思想创作,选择通过控

① [美]帕翠西亚·冈伯特:《高等教育社会学》,第295页。

② [美]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第24页。

③ [美]帕翠西亚·冈伯特:《高等教育社会学》,第296页。

④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95页。

制大学来抑制思想自由,不仅会导致价值观的混乱还会导致人的面具化和语言的毒化,这既不利于大学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中,对真理的追求曾居于核心地位。古典时代追求真理是为了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中古时代追求真理则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近代以来,科学革命以及知识价值革命导致了真理的隐退。19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研究制度化为大学的第二职能,真理作为一种求知的信仰,逐渐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对于现代大学而言,有用的理念已经取代求真的理念、求善的理念。换言之,现代大学的正当性更多的来自于科学研究成果的有用性而非追求真理的终极意义。源头上,大学的用途只是追求真理、生产思想,大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知识被区分成“有用的”和“无用的”,各种各样与真理无关的职能或用途被强加在大学身上。过度的使用严重损害大学的生命力。过量的用途约束了大学的想象力。表面上随着大学规模的增大,“为真理服务”的人似乎也在增多,但实际上在现代大学里人们对于真理本身或思想创作已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执著于科学知识的有用性或者仅是为了学术论文的发表。“现在科学要开始统治生活了。现在不是能产生成熟、警惕与和谐的个性的时代,而是进行也许是对国家最有用的工作的时代,人们将按照时代的需要来被塑造。这样他们也许很快就会在这部机器之中各就各位。”^①对大学而言,与对真理的追求或思想的创作相比,那些所谓的科学知识或许有用但并不特别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方法的改进,而对真理的追求或思想创作则需要献身精神。无论何时,追求真理和创作思想都是大学的正途,大学里的科学研究要服从于对真理的追求。如果大学对于科学的探究背离了追求真理的初衷那就意味着对于大学的滥用。如尼采所言:“一个人可以非常成功地变成一个冰冷的‘知识魔鬼’,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一大群博学的研究者,在一个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时代变成了一群魔鬼,那么,很不幸,通常说来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种伟大而强大的正义感。”^②我们时代的大学就极度缺少这种推动真理的最高贵的动力,今天的大学里多的是论文的高被引者或所谓的科学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本质上,大学的合法性深植于人类的精神生活而非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如加塞特所言:“把大学当作一种精神比把它当作一个机体更为合适。”^③如果由科学的有用性引发的对于大学的滥用使得对于真理的追求被废弃,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断让位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那么大学本身也将崩溃,至少也会变得极其脆弱而萎靡不振。巴尔赞在论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时曾举现代建筑和大型城市的关系为例。“高楼形成大城市,变为大城市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的人反对高楼,将高楼贬为非人的东西,将高楼的影响视为胁迫性的。人们想方设法抵制这种影响,试图使城市恢复以人为本的特征,他们建造和使用建筑,过度使用建筑,结果却将这种滥用合法化。”^④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伴随研究型大学的崛起,科学研究在现代大学中的滥用其过程与结局与之极类似。大学当然可以甚至必须通过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绝不应因此而放弃对于真理的追求。大学当然也可以参与人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创造,但追求真理始终是大学永恒的理念,是大学最根本的用途。与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相比,以思想创作为核心的真理是更高级的统治力量。大学若放弃了思想的创作或对终极真理的追求,科学本身也将沦为理性建构主义的玩物,行之不远。其结果,作为重要教育制度的大学也将被完全破坏。

总之,大学虽然不是有机体,但具有和有机体类似的逻辑,即进化或演化。大学是一个理性的机构,但大学本身却不是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逐渐演化而来的。基于理性建构主义的逻辑,现代人

①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56页。

②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44页。

③ [美]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第96页。

④ [美]巴尔赞:《艺术的用途和滥用》,第162页。

喜欢“重估”一切价值，“重构”一切制度。在现代人看来，既然国家都可以重构，大学制度当然也可以推倒重来。但历史表明，那些尝试先废除大学然后重建高等教育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大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真理或规律面前，再强势的统治者、再大的权力也无可奈何。如哈耶克所言：“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要不然就是认为，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甚至是更为恰当的设计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①现代大学的很多困境或危机就源于这种理性的自负。当前受到功利主义的驱使，人们对于大学索取无度，为了使大学能够满足社会的各种欲求，改革被不断的施加在大学身上。政府会尝试投入更多的钱，招聘更多的人，设计更好的制度，以使大学成为万能或全能的机构。但大学的改革绝不只是钱的事，甚至也不是人的事，大学的改革首先要弄清楚大学的本质。更何况，大学也不能一直处在“改革”的状态之中，好的制度建立后，接下来需要的应是持之以恒地付诸实践，而不是继续改革。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大学的本质，完全按照主观的愿望或某种欲望对于大学进行不间断的“改革”，无节制地供给各种各样的大学“制度”，那么若干年后，大学将真的成为普通高校，真正的大学将趋于绝迹。当然，由于高等教育本身具有政治性，让政府完全不干预大学也是不可能的。比较务实的办法就是，政府在主持或干预大学的改革时能更加的审慎而不是肆意妄为。政府能够做的应是诱导大学自己产生良好的秩序而不是设计好游戏的规则然后强加给大学。经验表明，大学自发产生的秩序在表面上看可能不够严密，甚至经常流于形式，但是它和由政府制定的规则相比，却有更强的生命力。大学制度的失效虽然也有大学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有人试图干涉甚至阻碍它的机制运行，或是想改进它的具体结果。”^②因此，无论是伦理上还是实际的用途上，好的大学制度需要的都不是尽善尽美的程序而是无穷无尽的可能。对于大学而言，政府的强势介入和顶层设计，既有可能堵住制度的漏洞也会窒息思想创作的空间。

（责任编辑：蒋永华）

The Uses and Abuses of the University

WANG Jian-hua

Abstract: There are so many characteristics and uses of the university, yet there is no such institution which can serve all purposes, just like there's no panacea. In modern tim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ading to the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of the university. As a result, the excessive prosperity arouses impractical attempt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of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government's non-stopping pursuit of all-round university, the abuses of the university will be inevitable. To meet the legal appeal of modern society, the scale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keeps increasing, even the university gets involved into making promises that will never be fulfilled. In the end, the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 to cultivate humanity is neglected,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s marginalized, and the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is fading away.

Key words: university; uses; abuses

① [英] 弗里德里希·奥克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② [英] 弗里德里希·奥克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95页。